

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共和国元帅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彼时正在军中、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共产党人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

领导协调抗日大局

1937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主任，负责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七七事变”翌日，朱德等人即联名致电北平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指出：“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他抓紧部署红军出师抗日准备，写下《实行对日抗战》一文进行号召动员。8月，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并提出多项具体建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朱德任总指挥，率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彭德怀身兼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等职务。7月5日，他还在西安与周恩来等人商议红军改编问题，8日晚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通过广播知悉事变，连夜部署红军调查渡河点，预备随时出动抗日。他要求战士们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练武项目，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痛击日寇。八路军成立后，他担任副总指挥，不断带来华北战场上振奋人心的捷报。11月，彭德怀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五个先决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和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西安事变之后就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协商抗日救国的办法，并将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意见整理后报告中央。他协调建议中央就时局发表主张见解，组织安排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积极推动全国抗战战略方针，还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在多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及红军代表处、江南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八路军成立后，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同时领导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等工作，在国共合作抗战中不断发挥着协商沟通的重要作用。

改编部队投身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时，贺龙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正在积极准备改编部队。他拥护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主张，对开赴抗日前线充满热情。“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但他也保持着对蒋介石的警惕性，指出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八路军成立后，贺龙任第一二〇师师长率部奔赴山西前线。依托灵活机动的战术和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力量，第一二〇师有力抗击日寇，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力。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黄土高原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热血沸腾，意绪难平。在前方战局瞬息万变的日子里，他心急如焚等待着国共两党谈判结果，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云阳一带积极组织部队练兵，随时准备开拔抗日。8月22日，红一军团作为红军先遣队向山西进发，聂荣臻完成出师部署后马不停蹄赶往洛川，在洛川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并提出应当关注军队出动与战略、游击支队、外交、财政等方面问题，这些考量也成为他日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基础。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共同指挥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平型关大捷之后，他受命留守五台山区，领导诞生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担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前后，为确保战士们接受部队身份的重大转变，迫切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来统一认识。罗荣桓组织编发了讲话提纲，派干部下部队搜集思想反映，亲自深入红四师第十团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内他几乎跑遍每个连队，和官兵像唠家常一样，深入浅出分析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不断强调共产党人不要忘了革命的目的，反复说明大敌当前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全力做好抗日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转换任务抗日为要

刘伯承当时担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等职务，并担任了援西军司令员，主要任务是援助西路军。全面抗战爆发时，他正在处理西路军的问题，收容援西军失散人员。7月22日，刘伯承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持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改编为八路军后，他担任第一二九师师长率部出征，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从西路军返回延安的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参与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以及洛川会议等，迅速投身到民族大业中去。他出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与师长刘伯承一道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与指挥了一系列对日作战。

“七七事变”时，陈毅还在南方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国民党停止“清剿”后，陈毅从别人送来的书刊中找到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这是他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来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形势出发，他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战略眼光和爱国情怀。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要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不宜全部集中抗日，陈毅坚决反对，他表示，“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改编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队长，投身到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

（据《学习时报》）

明代官俸之薄堪称历代之最，真相如何——

明代官员“清贫”吗？

在历史上，明代奉行的是“薄俸”制度，清朝人修《明史》时甚至认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大家都知道很多明朝诸如海瑞、于谦等清官清贫的故事，那么，明朝官员都很“清贫”吗？其收入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收入分析：官员家庭收入的特点

收入构成：官员家庭的生计来源

明代官俸之薄，堪称历代之最。从俸薪来看，明代与唐及五代相比，显然低了许多。据于慎行《谷山笔麈》一书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内阁大学士）的月俸，还不到五代北汉时的一半，与唐代相较，更是相差甚远。内阁大学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那些下层官员的俸薪就更微薄。据吕坤《呻吟语》记载，仓官每月的俸粮，只有1石；驿丞的俸金，一年也只有7两银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门服役人员的工食银，难免导致这些下层官员出现“不足供糶糴”的生活窘况。

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明代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道里费”的额度及其等次，大致为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二是柴薪银。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八日，冯梦祚正好任职南京国子监，就在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仅为1.78两。至于“柴薪银”，则收到了两项，其中额定的柴薪银为3.6两，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银加上闰月柴薪银共计13两。三是“廉给银”。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金事，照例每天有廉给银3钱，每月合计9两。

仔细分析明代官员的家庭收入状况，大抵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官俸微薄，且呈整体下降之势。明代官俸先是以钞折米，继而以布折钞，最后又有折银之例。正是因为官俸由本色改为折色，才使明代官俸与历代相比，最显低落。尤其是在实际发放及支取的过程中，因为“国用浩繁”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更使官吏俸给，“什措节其六七，所得不过其所费”。当然，所谓官俸微薄，不过是相对而言。若是与普通百姓相比，官员的俸给收入，实则较为丰厚。如一个兵部尚书月俸高达60石，而一个士兵的月粮仅仅1石，亦即尚书的收入是士兵的60倍。

二是官员俸给因官品、地域而存在着一些高低差别。官员品级高，俸米高；品级低，俸米低。这是制度规定。尤其是一些得到皇帝宠幸的官员，更是因为兼职而支取数份俸禄。例如，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杨士奇在少傅、内阁大学士二职之外，再兼兵部尚书一职。明仁宗所下旨意规定，杨士奇可以兼支三份俸禄。后因杨士奇极力推辞，才改为支取两份俸禄。明代南北两京官员的俸禄，同样存在着一些差异，体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点。

三是官员的额外收入明显高于基本收入。就官员收入来说，明代的官俸微薄，但额外收入很高。明代官员以“禄俸”为主的基本收入，与借助于“贪饷”而得的额外收入，两者之间的比较，正如曹于忬所言，出任做官之人，他们的禄俸“原自有限”，纵然“官至黄堂”，一年的俸薪也不过200两银子，但是，他们通过将“火耗”“赃罚”这些原本法律禁止私用的钱财归入私囊，或者借助于更多的“暮夜金”，亦即诸多受贿的钱财，所得额外收入显然远超官俸。据韩霖的记载，有一位知县致仕之后，对自己的“囊费”加以检点，大致有白银5000两，再加上“黄金彩缗”折合白银1000两，共计有6000两银的收入积蓄。知县的俸薪，即使为官10年，也就不过总收入450两银子而已。

家庭生计：官员家庭生活水平蠡测

有一个误会性的偏见必须得到澄清，即一人仕途，即可致富发家。其实并未尽然。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同样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明代官员的贫富分化，显然取决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与小官之间，生活境遇迥然有别。由此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家庭生计的两极分化：

一是家计富厚。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在松江府的官员群体中，如布政司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璜、主事吴哲，家中均“积至十余万”。家资高达10余万两银子，显然已是相当富厚。即使新中的进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场趋奢之风，纷纷过起了奢华的生活。这些官员大多已经相信，奢华的生活可以通过日后的官场生涯得以维系。换言之，官员的身份可以换取富厚的生计。

二是家计清贫。在明代的官员群体中，确乎也有不少人的生计，仍然处于一种清贫的状态。明代官员家庭生计，并非一概是“朱门酒肉臭”的景象。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崇祯朝的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称得上位极人臣，但他被抄家时，所抄没之财，不过“六白金”，亦即区区600两银子。此外，薛国观居住的房舍，客厅只有三间，居室也不过四进而已，而且均是“世产”，即祖上传下来的房产。又如，东林党人魏大中在江南官习普遍接受富户诡寄的风气下，却从不接受他人投献、诡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仅有田25亩。至于那些身为官员典范的清官，更是无不家计清贫，其例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初任官员陷于困顿的窘境，甚至导致“京债”的盛行。以观政进士为例，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李廷机的上疏可知，他们在观政候选之时，生计已是相当“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称贷”。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未职的官员，更是穷困潦倒，有的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官员上任之后，除了“剃下”之外，只能“借库银以偿之”。明代官员贪贿索賂，甚至盘剥百姓，盖有其因。

毫无疑问，无论是穷官、冷官，还是清官，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仅可称之为“清贫”，实则与普通民众之“贫困”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换言之，官员生计的清贫，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化，有时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欢“哭穷”的习惯所致。随之而来者，则是明代官员快乐精神的内在分化：一部分官员仍然坚守“孔颜之乐”，不以贫贱而慕乎外，不以富贵而动于中，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另一部分官员则转向基于“不知足”之上的“富乐”，甚至为了及时行乐而放弃官德操守。

（据《北京日报》）

读史忆人典故

“万婴之母”林巧稚

林巧稚（1901年—1983年），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鼓浪屿的伟大女儿。她一生未曾婚育，却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新生命，被誉为“万婴之母”。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晃岩路47号的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学到中学，敏而好学，学习和品格都表现突出，1919年，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年18岁。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上海招生，林巧稚与女友一同赴上海应试。可是正当考试就要结束时，女友突然晕倒在考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林巧稚没有多想，不顾自己还未答完的试卷，毅然前去照顾着女友。这一舍己助人的行动被考官看在眼里：这不正是一个医生应该具有的品德吗？林巧稚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考官，加之她英语娴熟而准确，虽然没有答完试卷，她还是被北京协和医学院破格录取，从此走进了医学殿堂。

1929年，林巧稚经过8年苦读，闯过了当时淘汰率高达40%的竞争，不仅获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学位，还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时，林巧稚被聘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成为协和医学院第1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

1933年，她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1939年，又赴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回国后的林巧稚担任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北大医学院教授。

从那之后，她在产房里度过了60多个春秋，亲手迎接了5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傅作义的小儿子、冰心的3个孩子、梁思成的2个子女等都是由林巧稚接生的。

林巧稚从小就确立了一个理想：怀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1941年，侵华日军强行关闭北京协和医院，她便在北京东堂子胡同10号租了几间房子开办私人诊所，挂牌行医继续医治病患，经常为穷人免费施诊。

从1942年4月小诊所开业到1948年5月北京协和医院恢复，6年的时间，在那个小小诊所里，填写了8887份病历。她教育妇产科的所有人：“救活一个人，救活一个孕妇、产妇，就是救活了两个人。”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林巧稚坚守本心，医治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为很多家庭带来了希望。群众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情，就把林巧稚接生或资助过的婴儿取名“念林”“爱林”“纪林”，以示对林巧稚的永久纪念。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林巧稚和许多爱国的科学家一起毅然留在祖国为人民服务。她为新中国妇科医学事业的发展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与热情，攻克新生儿溶血症，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组织大规模子宫肌瘤的普查和防治，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使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主编了多本妇科学术著作及科普读物，在缠绵病榻的最后3年里，她仍坚持参与《妇科肿瘤》的编写，该书浓缩了林巧稚毕生对妇科肿瘤的探索和研究，记载了她为医学事业所尽的最后一份力。

1961年，林巧稚回鼓浪屿小住了半个月，这是她自年少离开后唯一一次回故乡看望家乡。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逝世，享年82岁。

林巧稚的墓志铭上镌刻着：“只要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这正是她一生所求，也是她的生命写照。邓颖超亲手在她的塑像旁种下南洋杉，以纪念这位中国卓越的妇产科医生。

（据《人民政协报》）

拾遗

叶圣陶的“小题大做”

现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在担任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期间，国家正在推广普通话。众所周知，普通话的推广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学校又是以中小学为基础的，中小学又是以语文教学最为关键的。叶圣陶自知身上的责任重大。因此，他严把每一篇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

叶圣陶是江苏人，平时说苏州话较多。为了语言规范化，他要求文章入选课本前，需经北京语文老师朗读，以查验语句是否通顺，音节是否优美。

一次，一位老师为叶圣陶朗读文章，读得较快。叶圣陶打断他，指着课本上的语句问：“这句话到底是读‘东西掉到井里了’，还是‘东西掉井里了’？”

这位老师搪塞道：“我想这两种读法都一样。”叶圣陶接着问：“依你看也就是‘到’字在这里是多余的？”这位老师难为情地笑了笑，借故离开了。

叶圣陶为了找到准确答案，决定召开一个主题讨论会，确定一下

“到”字的应用。对于主任的决定，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为了一个字召开一个主题讨论会有必要吗？”也有的人毫不客气地说：“这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

见此情景，叶圣陶微笑着向大家解释：“大家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静下心来想想，我们做编辑尚且拿不准的句子，怎么能印刷出来交给学生呢？这虽然只是一个字的小事情，但关乎几百万中小学生的事情，就应该作为大事情来对待。”

听了叶圣陶的解释，编辑纷纷点头称赞，他们分头寻找资料，落实“到”字的准确用法。次日，讨论会开得很成功，与会者踊跃发言，大家详细介绍了“到”字在句子中的意义，在此句子中“到”有达于某一点，即到达的意思。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到”字在这句话中有一定含义，不可随意删去。

为了一个“到”字召开一次主题讨论会，看似“小题大做”，其实是彰显了叶圣陶精益求精、恪守职责、严谨自律、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据《人民政协报》）

尼克松保镖吃烤鸭

尼克松访华带着自己的保镖团队。这批保镖十分尽职，中美两国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期间，他们就待在会谈大厅外的过厅里。一次，看他们等待时间较长，负责接待的同志就给他们上了烤鸭。

香喷喷的烤鸭引起了保镖们的注意，他们垂涎欲滴，却一通比画，不知道怎么办。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拿起一块荷叶饼，夹上烤鸭、葱丝，抹好甜面酱，灵巧地一卷，便做好了个烤鸭卷，递给靠得最近的一个保镖，自己再去

卷第二个。别的保镖见状纷纷伸过手来。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发现里面的两国领导人已经站起身来，看来是要走了。这一下美国保镖们急了，一个保镖急忙把烤鸭卷往嘴里塞，一口咬下去，甜面酱喷溅出来，顿时顺着他的手腕流淌下来。只见这个“外星人”把手臂往上一抬，凑到嘴边吸了两下，已经舔干净。他戴着墨镜冲服务员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掉头追着同伴和他们的总统去了。

（据《天津日报》）